

The Story of Life

先贤与城市记忆

—— 口述历史专辑 ●

伊 华 马学强 主编

中西書局

先贤与城市记忆

——口述历史专辑●

伊 华 马学强 主编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贤与城市记忆：口述历史专辑（一） / 伊华，马学强
主编. —上海：中西书局，2014. 10
ISBN 978-7-5475-0719-3

I. ①先… II. ①伊… ②马… III. ①上海市-地方
史-史料-近代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0707 号

先贤与城市记忆

——口述历史专辑(一)

伊 华 马学强 主编

责任编辑 李碧妍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版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19.5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719-3 / K·150

定价 30.00 元

序 言

■ 熊月之

历史是多义词，一指已经发生的人、事、物，即历史事实本身；二指关于这些人、事、物的信息呈现，即历史记载；三指对于这些人、事、物的评价，即历史评价。人们日常所说的历史，其含义每每交错、混合。说“历史不会重演”，是第一义；说“历史文献”，是第二义；说“历史是公正的”，则是第三义。历史事实本身不会说话，必须由信息呈现出来，诸如人物的生平、言论、事功，事件的时间、地点、动因、始末，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如果没有此类历史信息的呈现，则历史研究与评价便成为无源之水。因为有了史家的记载，霸王别姬才成为千古绝唱。因为没有信息呈现，秦始皇陵设计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是谜。历史上有成千上万个不解之谜，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历史信息呈现不充分。

历史信息的呈现永远小于历史事实本身。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就历史记载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方兴未艾的口述史展现了无比广阔的空间。

福寿园入住了数量可观的历史名人，有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有家喻户晓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有见义勇为的烈士，有遗爱人间的劳模。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承载着

历史的一章一节、一枝一叶、一点一滴。福寿园集团的领导慧眼独具，见深识远，发挥福寿园与名人亲属联系密切的优势，斥资从事口述史工作，编辑这部《先贤与城市记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既在研究者与福寿园入住名人亲属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将他们已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事迹挖掘、整理出来，为复原历史真实提供了难得的细节资料，丰富了上海人文资源的宝藏，也为纪念先贤、教育后人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道特别的风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动人故事，都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相信读者诸君看了这部《先贤与城市记忆——口述历史专辑》，一定会有同感。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目 录

一生正直护公平

——父亲王一平与上海 王时驹(1)

回忆父亲董健吾..... 董云飞 口述/袁家刚 采访整理(19)

回忆曾祖父贝润生..... 贝念正 口述/王 宵 采访整理(47)

千种缘由莫能解

——回忆姨夫顾维钧、姨母严幼韵

..... 徐景灿 口述/梁忆湄 章 磊 采访整理(59)

卖花人去路还香

——女儿眼中的丰子恺

..... 丰一吟 口述/刘雪芹 采访整理(69)

忆父亲施蛰存先生..... 施 达 口述/施如怡 采访整理(85)

我所了解的父亲傅雷先生

..... 傅 敏 陈哲明 口述/李家涛 采访整理(105)

应云卫：用生命谱写中国“剧影春秋”的艺术家

..... 应大明 应大白 口述/胡 端 采访整理(125)

被隐没的大师

——回忆中国动画先驱钱家骏

..... 朱子颖 钱珊朱 口述/唐幼幼 周 珏 采访整理(149)

情定西厢,艺术长生

——忆弹词名家杨振雄

…… 朱迎迎 许君伟 口述/金 坡 刘晓海 采访整理(177)

“响”在弦上

——一代“琶王”张鉴国

张建华 蒋淑馥 史明生 口述/张盛满 解 军 采访整理(195)

迟到的怀念

——回忆我的父亲唐振常 唐 明(217)

回忆我的父亲金重远..... 金 松 口述/张勇安 采访整理(249)

我的姑父毛守白教授..... 陈学东 口述/施如怡 采访整理(267)

医者本色:“东方一只眼”

——忆我们的父亲赵东生

..... 赵之凡 赵乃凡 口述/海 珂 采访整理(285)

后记 301

一生正直护公平

——父亲王一平与上海

王时驹

【作者简介】王时驹，王一平长子，1950年出生，1970年1月入伍，1971年5月入党，1975年3月退伍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现退休



王一平(1914—2007)

王一平(1914—2007),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初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历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政委、26军首任政委、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委、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委员。2007年2月在上海病逝。

父亲王一平原名王炳真，1914年12月出身在山东荣成海边的一个渔民家庭。父亲高小毕业以后，曾一度辍学，帮助爷爷出海打鱼，维持生计。1932年，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取山东省第七师范学校（即文登乡师）。很快接受进步思想和地下党教育。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

1935年秋，父亲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胶东“一一·四”暴动。因敌我力量悬殊，武装暴动失败。父亲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1936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父亲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大批平津爱国青年到西安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父亲在随东北军撤离西安途中接到上级党组织指令，转赴延安。

父亲于1937年初到延安，加入红军，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中共党校学习。毕业后，党组织安排父亲回山东，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父亲凭着坚定信念和才能，在党的培养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迅速成长为我军高级政工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父亲在解放上海战役中

1949年2月9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父亲任政委的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6军。父亲任26军首任政委。首任军长是张仁初（1955年授中将军衔，济南军区原副司令员）。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父亲王一平时任 26 军政委，与军长张仁初(右)、副政委李耀文(中)在一起

父亲与张仁初军长率三万两千多名将士，于 21 日至 23 日强行突破长江天堑，向江南进军。

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被我军突破后，蒋介石急令汤恩伯的八个军二十余万人聚集上海，企图阻击我军前进。争取时间抢运物资，掩护战略退却，破坏市区建筑。

1949 年上旬，原属第八兵团的 26 军奉命归 10 军团指挥，会同六兵团也是八个军担负起解放大上海的历史使命。

上海为我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国民党在此设有永久性、半永久性和活动壁垒数千个，有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配合，有高大

坚固的建筑物作依托，构成了有重点、有纵深的立体防御体系。敌人企图把上海打烂、搬空，固定6个月，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依靠帝国主义帮助他们卷土重来。

更为不利的是，中央和前委指示，既要消灭敌人，还要保全上海，严令不准使用重火炮，这就如“瓷器店里打老鼠”，无疑加大了解放上海的困难。26军在苏州休整和备战期间，父亲和张仁初军长向部队逐级传达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前委的战略部署，父亲进行了政治动员，着重强调要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学习城市常识，认真执行警备任务，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为花花世界所迷惑，要严厉打击匪特分子的破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待外侨的正常活动要保护，等等。

5月11日，解放上海外围战斗打响，父亲和张军长率部逼近昆山守敌123军第182师，敌以水网阵地层层设防。26军第78师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182师利用夜色掩护弃城东窜，78师向敌追击。12日中午，26军第76师乘400只民船沿苏州河东进，当晚攻占西巷，恰遇东窜之敌182师。76师一营指战员跳入齐胸的河中急涉登上对岸，向迎头窜来的敌182师先头部队猛烈开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大乱。182师部分敌人乘坐一辆火车向昆山逃出，被我先前达到的78师阻截。他们炸毁铁路，击毁车头上的照明灯，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跳下火车的敌人疯狂抵抗，遭我军猛烈射击。在我军战士的猛烈冲击下，车上车下300余人成了俘虏。这一仗歼敌182师师部及两个团，装甲列车第二纵队第六中队，歼灭生俘1700多人。

27日拂晓，上海之敌被全歼，上海解放。26军取得很大战果，共歼敌4.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500门，坦克300辆，汽车240辆，各种枪2万余支（挺），部队经受了攻击有现代化设防的大城市的锻炼，实现了解放大上海、为人民立大功的心愿。

5月27日下午，枪炮声刚停，战火硝烟尚未完全散去，26军便在

江湾、五角场集结，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到上海市区担任警备。父亲再次对各级干部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做到“秋毫不犯，原封不动”的保证。全军指战员自觉忍受和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像执行战斗命令一样坚决维护政策等纪律的严肃性，如在开封战斗中，荣获“遵纪模范连”称号的第227团二连，冒雨进入市区，为了不惊扰市民，暂住杨浦一所小学，怕身上的泥水弄在了桌凳上，便穿着湿湿的衣服在地上坐了一夜。有一排负责警卫英商发电厂，因住房小，部分同志露宿在外，工人们送来麻袋、毯子让他们用，他们立刻叠好送返。

有一个班单独执行警卫音乐专科学校的任务，开始几天，每天吃干粮，喝生水，啃咸菜，睡光地。教师们诚恳地要求他们在床上睡，他们不去。教师们送来开水并怜惜地向战士们说“喝自来水容易生病”，战士们说“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生喝过山水、井水、河水、江水，如今喝自来水是改善生活了”。部队真正做到了缴获的一针一线也要交公，群众送来的一支烟也婉言谢绝。

正当军民们沉浸在愉快的气氛中时，一件不幸的事故发生了。6月初，230团一个新战士，在南市区四明银行后门站岗时冲锋枪走火误伤了5个行人。南阳女中一个学生受重伤送到济民医院治疗。父亲和军其他领导对这一事件极其重视，立即通报部队，将走火战士押送到军法处审处。230团领导干部立即检查自己教育不周，请求处分。他们的检查在军报上公布，团政治处两个股长专做伤者和家属工作。父亲和军、师、团领导都去探望伤者和慰问家属，表示一切费用都由部队负责。济民医院梅院长为我军这种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所感动，表示要用最好的药品和技术治愈重伤的女学生。后来，女学生痊愈了，南阳女中在出事的第二天便出动宣传队，上街说明真相，防止坏人造谣，并写信给部队要求从轻处理走火的战士。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上海人民对子弟兵的体谅和关怀。

二、五六十年代父亲在上海

随着解放上海战役的胜利，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父亲进驻上海。1952年2月，陈老总亲自点将，要父亲到上海市委工作。开国上将、八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曾对我说，他当时给陈老总打电话，希望我父亲仍留在部队工作。可陈老总在电话里就说了一句：“这是命令。”



1951年父亲(右二)时任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与八兵团司令王建安(中)在一起拍摄于上海

于是，父亲出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母亲也跟着脱下军装，带着我们姐弟四人(那时还没有我妹妹)从南京迁

到上海。

当时正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进入高潮。中央严厉批评上海“打虎”工作不力,说其他地方“老虎”越打越多,上海“老虎”越打越少。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即在上海召开全市党员动员大会,批评上海“三反”运动落后于全国各地。会上宣布对 15 名贪污和“打虎”不力的负责干部处于撤职、查办、停职反省等处分,要求改变这种迟缓状态。身为“三反”运动领导成员的父亲,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父亲说:“什么叫‘老虎’越来越多,‘老虎’越来越少?‘老虎’应该有多少打多少,更不应该事先定指标。”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潮流中,父亲的意见是丝毫起不到作用的。动员大会后,市委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将“打虎”预定从 3 500 只提高到 8 000 只。而最后上海打“大老虎”1 390 只,“小老虎”8 303 只,比预定指标多打了 1 000 多只。其结果,打出了许多假“老虎”,造成了许多冤案。中央也认识到“打老虎”运动的扩大化,要求各地进行甄别工作。5 月下旬,全市布置各单位进行一次复查,“小老虎”的数量由原来的 8 303 只下降为 1 012 只,“大老虎”由 1 390 只下降为 36 只。

事实证明,父亲当时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父亲的思想与当时的“思潮”不合拍,也“不入流”,而父亲也不愿违背自己对于事物的认知和判断,更不能违背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则,同时,由于长期紧张工作,患有神经衰弱等疾病,父亲于 1952 年下半年辞去组织部长的职务,到大连、青岛休养。

1955 年 1 月,父亲又复任上海市委组织部。不久,全国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彭柏山与胡风 30 年代在上海认识,彼此之间有书信往来,被中央高层内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理人,上海市委为此成立了“彭柏山专案组”。由市委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陈丕显担任组长,父亲任副组长,具体负责此案。在此之前,父亲和彭柏山并不很熟悉,两人没有私交,只是工作关系。解放上海时,父

亲是 26 军政委，彭柏山是 24 军副政委，两人只是在华东军区开会时才见面。按现在的说法，只是点头朋友。彭柏山于 1953 年 3 月调市委宣传部接替谷牧任宣传部长。此时，父亲正在休养。

父亲怀着对工作、对同志极端负责的态度，认真查阅了彭柏山与胡风之间的来往书信和其他材料，并没有发现两人之间有什么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行动。因此，父亲不同意将彭柏山定为反革命分子。

在一次讨论彭柏山问题的专题会议上，父亲与专案组其他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市委领导根据中央高层的指示，执意要逮捕彭柏山。父亲在会议上坚持党性立场，坚持组织原则，据理力争，毫不妥协，坚决不同意逮捕彭柏山和开除彭柏山党籍。最后，父亲将所有专案组的材料放在桌面上，说：“要我仅凭这些材料将彭柏山打成反革命，我做不到，你们另请高明吧！”之后不久，父亲毅然向组织辞去了组织部长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再次休养。

父亲的努力和抗争并没能改变彭柏山的命运。不久彭柏山即被逮捕，开除党籍，判处徒刑。在狱中，彭柏山曾自杀未遂，后提出要见父亲。经组织批准，父亲到狱中看望彭柏山，并作了思想工作。彭柏山的情绪这才逐渐稳定下来。刑满释放后，彭柏山被流放青海，随后又被安排到厦门大学当一名普通教师。20 世纪 60 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父亲受柯庆施委托，前往福建前线检查战争工作，还顺便到厦门大学看望了彭柏山。后来有人写信到中央告状，说彭柏山这样的人不宜放在福建前线，彭柏山又被调到河南农学院。“文革”初期，彭柏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粉碎“四人帮”后，彭柏山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父亲参加了彭柏山的追悼会，并尽自己所能，将彭柏山的子女调回上海落实政策。

1957 年 7 月，父亲在上海第一次党代表会上当选市委常委。

1957 年，父亲主动到上海博物馆任馆长。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反右”斗争在全国展

开。上海博物馆是知识分子成群、“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按照当时划分“右派”的标准,可以说是“一抓一个准”。市文化局也给博物馆下达了“右派”指标。对此,父亲再次挺身而出,凭借市委常委的身份,对文化局领导说:“我已做过全面调查,博物馆没有一个右派。”当上面坚持要抓博物馆“右派”时,父亲坚决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抓几个‘右派’,那就算我一个。”父亲就是这样宁愿自己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也要尽其所能保护博物馆的广大知识分子免遭迫害。博物馆这样的文化单位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右派”,这在全国文化系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到1958年春“反右”结束的时候,全国共处理了55万“右派”分子,而上海被定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是1.63万人。

1958年,父亲任上海城市人民公社领导小组组长,对当时大跃进的狂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次父亲到上海市委机关大楼(现静安宾馆),见门口大铁门不见了,就下车问门卫是怎么回事。门卫说:“被拆掉拿去炼钢铁了。”父亲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以此为例,批评这种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做法。为此,父亲再次被指责为思想“右倾”。

1962年在一次市委书记柯庆施主持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街道里弄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光耀汇报工作,她较多地说了现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柯庆施当场发了脾气,他训斥道:“你们的口气怎么跟民主党派一样!”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刘光耀紧张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这时,父亲站起来说:“今天会议的汇报内容是我们共同商定的,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承担责任。今天各区的负责同志都在,大量工作是他们做的,请他们说说,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要不要引起领导的重视,该不该帮助他们解决。”柯庆施见父亲说了话,也感到自己刚才的态度不妥,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会议继续进行。

父亲于1962年6月任市委秘书长,1963年12月任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任书记处书记。